第四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学校	清华大学	院系	建筑系
专业	建筑学	姓名	苏晗
年级	大五	任课教师	杨梦
课程名称	犹太文明		
论文题目	加利利犹太会堂与罗马巴西利卡建筑比较研究		

加利利犹太会堂与罗马巴西利卡建筑比较研究

【摘要】

犹太会堂是重要的建筑类型之一，不仅在特定的宗教文化社区中承担核心功能，而且在更加广阔的宗教建筑发展历史中发挥奠基作用。在对其历史沿革的研究中，加利利地区早期犹太会堂因其丰富的考古证据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在建筑形式上，这一遗址群具有典型的巴西利卡建筑特征，与同时期的罗马巴西利卡教堂，以及更早期的罗马巴西利卡公共建筑具有可比性。因此，文章选取加利利犹太会堂与罗马巴西利卡建筑中的代表案例，并对其建筑特征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对比两者在平面布局、空间构成、建筑功能等方面的特征与异同，并关注两种建筑在发展过程中展现的多样性与其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键词】

犹太会堂；加利利地区；巴西利卡；比较研究

一、引言

作为典型的宗教建筑形式之一，犹太会堂在犹太教和犹太文明中具有核心地位。作为聚会之所（beth knesset）、祈祷之所(beth tefillsh)和学习之所（beth midrash），两千多年来，犹太会堂一直是犹太社区生活与宗教的核心，既是犹太人在大流散时期的文明承载者与记录者，也为其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宗教建筑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这个庞大的建筑历史叙事中，加利利地区早期犹太会堂（Early Synagogues in the Galilee，以下简称“加利利犹太会堂”）占据了重要位置。加利利位于以色列北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Tentative Lists -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描述，该地区聚集的遗址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证据：加利利地区已发掘出近 50 处犹太会堂遗迹，成为全球犹太会堂最集中的建筑遗址群之一[1]。在遗址出土前，对犹太宗教建筑的研究主要依靠文献资料，如希伯来圣经中对会幕（the Tabernacle）和所罗门圣殿（Solomon's Temple）的文字描述，这使得对于犹太会堂出现的确切日期一直难有定论[2]。加利利地区出土的遗址弥补了对于犹太会堂建筑发展的认知缺口，因此成为研究探讨犹太文明与宗教建筑历史发展的共同关注。

---

[1] Centre, UNESCO World Heritage. “Early Synagogues in the Galile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2000-06-30[2023-12-24], https://whc.unesco.org/en/tentativelists/1470/.

[2] Lee I. Levine, "The Synagogues of Galilee," *Galilee in the Late Second Temple and Mishnaic Periods Volume 1: Life, Culture, and Society*, 2014, p.130.

图 1 加利利犹太会堂遗址[1]

建筑形式上，加利利犹太会堂以其典型的巴西利卡（Basilica）建筑特征闻名。因此，通过与这一建筑形式中最具代表性的罗马巴西利卡建筑进行对比研究，能够将其与更广泛的宗教建筑发展相联系，从而理解犹太会堂在其中所处位置与意义。时间上，加利利地区的大部分遗址可追溯到古典时代晚期（Late antiquity，公元 3 世纪至 8 世纪）。在这一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过渡的历史阶段中，深刻的宗教变革也带来了宗教建筑的蓬勃发展[2]，其中尤以基督教和犹太教为主，而两者都将巴西利卡作为最常见的宗教建筑形式。因此，通过对加利利犹太会堂和同时期罗马基督教巴西利卡教堂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深入了解其相互影响下的相似性与各自发展的鲜明特点。

此外，本文进一步主张将前基督教的罗马巴西利卡（pre-Christian Roman Basilicas）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在建筑特征上，加利利犹太会堂与非宗教性的巴西利卡具有鲜明的相似性，这源于二者共同的建筑原型，即希腊时期的柱廊（stoas）。由于在建筑发展的过程中，巴西利卡在被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确立为基督教教堂的建筑形式前后具有难以分割的连续性，因此在作为比较对象时不应当按照时间阶段进行分割。另外，尽管本身的宗教职能更受关注，加利利犹太会堂同样具有社区的公共职能，因此能够与作为公共空间的罗马巴西利卡建筑产生明确的可比较性。通过对建筑特征异同点的提取与分析，本文将加利利犹太会堂更加明确地定位于同样作为宗教与公共建筑的罗马巴西利卡建筑更为广阔的发展轨迹中。

---

[1] 图片来源：World Heritage Site, "Early Synagogues in the Galilee," 2023-05-04[2023-12-24], https://www.worldheritagesite.org/tentative/id/1470.

[2] Raimo Hakola, "Galilean Jews and Christians in Context: Spaces Shared and Contested in the Eastern Galilee in Late Antiquity," *Spaces in Late Antiquity*, Routledge, 2016, pp.141-165.

二、文献综述

对于加利利地区建筑遗址的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并在挖掘初期就将其划归为犹太会堂[1]。德国建筑史学家海因里希·科尔（Heinrich Kohl）和考古学家卡尔·瓦辛格（Carl Watzinger）完成了开创性的工作，在 1916 年的共同著作 *Antike Synagogen in Galilaea*[2]中对 11 座犹太会堂的部分发掘成果进行了详细的绘图和描述，为这一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3]。随后，犹太考古学家陆续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以利亚撒·苏克尼克（Eliezer L. Sukenik）在其 1934 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 *Ancient Synagogues in Palestine and Greece*[4]中确立了对于加利利犹太会堂研究至关重要的建筑类型划分[5]。这种按年代划分的方法将加利利犹太会堂分为三类：约公元 2-3 世纪的“早期加利利式”（Early-Galilean）或“巴西利卡”（Basilica），其特点是典型的主立面朝向耶路撒冷的平面图；约公元 4 世纪的“过渡式”（Transitional）或“宽厅式”（Broadhouse），其特点是入口位于较长墙面的宽厅形平面图；以及公元 5-6 世纪后期出现的“拜占庭式”（Byzantine）或“拱顶式犹太会堂”（Apsidal Synagogue）[6]。

在研究初期，加利利犹太会堂与巴西利卡建筑之间的联系仅局限于一个相对狭窄的时间范围内。然而，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对遗址年代和建筑类型的严格分类提出质疑，精确整齐的三层分类受到了挑战。李·莱文（Lee I. Levine） 和裘蒂·马格内斯（Jodi Magness）等学者通过更加精确的地层年代测定，对曾经固定的分类方法提出质疑，进而打破原有的时间界限，使加利利犹太会堂融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并且为更全面和整体地的研究奠定基础[7][8]。

另一方面，对罗马巴西利卡的整体研究也在二十世纪得到了发展。瓦伦丁·穆勒（Valentin K. Müller）于 1937 年在著作 *The Roman Basilica*[9]中首先聚焦于作为罗马公共建筑的巴西利卡，并对其进行历史溯源[10]。约翰·帕金斯（John W. Perkins）在 1954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对前基督教的罗马巴西利卡进

---

[1] Dennis E. Groh, "The Stratigraphic Chronology of the Galilean Synagogue from the Early Roman Period Through the Early Byzantine Period (ca. 420 CE)," *Ancient Synagogues*, Volume 1, Brill, 1998, p.51.

[2] 原书为德文，标题为“Antike Synagogen in Galilaea”，译为“加利利的古代犹太会堂”。

[3] H. Kohl, C. Watzinger, *Antike Synagogen in Galilaea*, Leipzig, 1916, pp.4-40.

[4] 译为“巴勒斯坦和希腊地区的古代犹太会堂”。

[5] Eliezer Lipa Sukenik, "Ancient synagogues in Palestine and Greece," *The Schweich lecture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34.

[6] 苏克尼克教授最初使用的术语是“Early-Galilean”，“Transitional”，“Byzantine”，本文后续提及加利利犹太会堂的三种建筑分类时均采取此分类及命名方式；关于另一套命名用词（“Basilica”，“Broadhouse”，以及“Apsidal Synagogue”），参见 M. Avi-Yonah, "Ancient Synagogue," *Aerial* (32), 1973, pp.29-42。

[7] Lee I. Levine, "1. Diversity in the Ancient Synagogue of Roman-Byzantine Palestin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Diversity and Rabbinization: Jewish Texts and Societies between 400 and 1000 CE* (8), 2021.

[8] Jodi Magness, "The Question of the Synagogue: the Problem of Typology," *Judaism in Late Antiquity* (3), *Where We Stand: Issues and Debates in Ancient Judaism,* Brill, 2001, pp.1-48.

[9] 译为“罗马的巴西利卡建筑”。

[10] Valentin K. Müller, "The Roman Basilic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41, 1937, pp.250-261.

行了全面的总结，而著名建筑家、艺术史学家理查德·克劳特海默（Richard Krautheimer）则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将研究重点扩展到建筑形式与历史背景间的相互关联[1][2]。在后者的关键性文章 *The Constantinian Basilica*[3]中，加利利犹太会堂作为古典时代晚期的巴西利卡形式变体被提及[4]。

由于认识到加利利犹太会堂与罗马巴西利卡之间的密切关系，两者之间的异同与相互影响逐渐成为重要的议题。例如，历史学家玛丽莲·夏（Marilyn J. Chiat）于 1980 年进行对古典时代的犹太会堂与教堂建筑的相似之处进行了比较研究[5]。不过，这项研究的主要成果是提出另一种年代划分，而非深入探讨建筑形式本身。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的文献与考古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从罗马共和时代晚期到古典时代晚期的时间跨度范围内的典型案例，将加利利犹太会堂与罗马巴西利卡（包括前基督教公共建筑与基督教教堂建筑）进行建筑比较。

三、比较研究

为使比较研究既具全面性又不失重点，本文选择加利利地区经过广泛研究、相对知名且能够涵盖三种建筑分类的遗址作为犹太会堂的代表案例；在罗马巴西利卡中，从确定的历史时期框架中选择典型的宗教性与公共性巴西利卡式建筑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平面布局、空间组成和建筑功能三方面对所选案例的异同进行比较探讨。所选案例包括：

表 1 比较研究案例选择[6]

	类别	案例
加利利犹太会堂	早期加利利式	吉什（Gush Halav）， 迦百农（Capernaum）， 莫兰（Meiron）、加姆拉（Gamla）
	过渡式	基尔贝（Kirbet Shema）
	拜占庭式	提比里亚（Hammath Tiberias）， 贝丝阿尔法（Beth Alpha）， 加德尔（Hamat Gader）
罗马巴西利卡	前基督教会堂	法农会堂（Basilica at Fano）， 庞贝会堂（Pompeii Basilica）
		马克森提乌斯巴西利卡 （Basilica of Maxentius）， 朱里亚巴西利卡（Basilica Julia）

[1] J.B. Ward Perkins, "Constantin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Basilica,"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22), 1954, pp.69-90.
[2] Richard Krautheimer, "The Constantinian Basilica,"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21, 1967, pp. 115–140.
[3] 译为“君士坦丁时代的巴西利卡建筑”。
[4] Richard Krautheimer, "The Constantinian Basilica,"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21, 1967, p.124.
[5] Marilyn J. Chiat, "Synagogue and Church Architecture in Antiquity: A Comparative Study," *Proceedings of the 8th World Congress of Jewish Studies*, 1982.
[6] 加利利犹太会堂全部遗址名录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Early Synagogues in the Galilee”词条。

	基督教教堂	君士坦丁大殿 （Basilica of Constantine at Trier）， 拉特朗圣若望大殿 （The Lateran Basilica）

（一）平面布局

在对加利利犹太会堂遗址进行早期勘探与分析时，最初将其全部归类为巴西利卡形式[1]。其特征是平面上具有两排与长轴平行的柱列，并且首层以此分为中厅（nave）和两侧过道（aisles）。虽然大多数遗址案例符合这一描述，但也有少数的例外，成为增添建筑形式多样性的原因之一。

基本的建筑形式以吉什、基尔贝和贝丝阿尔法为例，平面中两排四根柱子与南北长轴对齐（图 2）。相比之下，在莫兰和迦百农的遗址中，长厅较短一端的一排横向柱列分隔出一条宽约 2.1 米的端廊，将两道侧廊连接起来。另一种变化出现在提比里亚的平面中，其入口一侧，而非长厅远端，增加了一排柱列，从而形成了单独的门廊并显著改变了入口的空间体验（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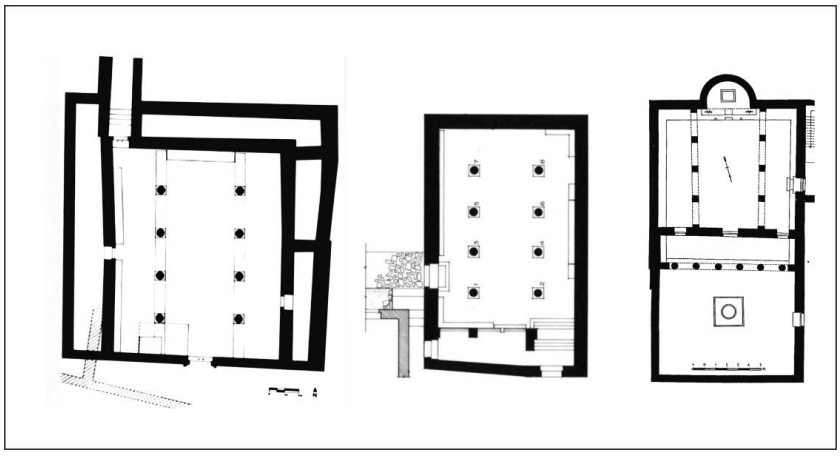

图 2 吉什、基尔贝、贝丝阿尔法的平面[2]

[1] William G. Tachau,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ynagogue,"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1926, pp.155-192.

[2] 图片来源（从左至右）依次为：

Eric M. Meyers, Carol L. Meyers, & James F. Strange, *Excavations at the Ancient Synagogue of Gush Halav*, vol. 5, Eisenbrauns, 1990, p.69；

Eric M. Meyers, "Ancient synagogues in Galilee: Their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etting,"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43, no.2, 1980, p.103；

E. L. Sukenik, *The ancient synagogue of Beth Alpha: an account of the excavations conducted on behalf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2: plat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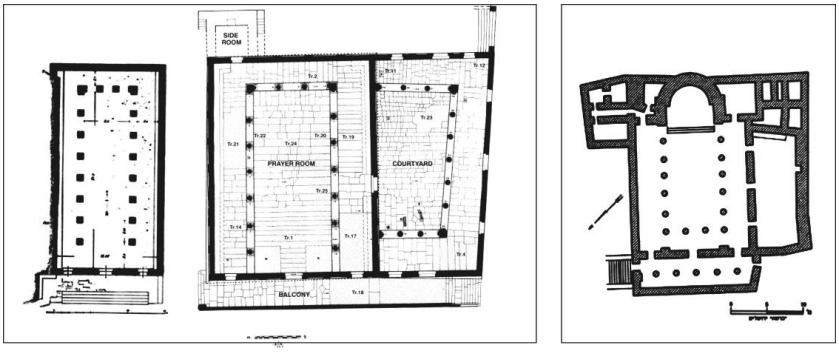

图 3 莫兰、迦百农、提比里亚的平面[1]

如果说早期加利利式与过渡式的区别在于入口的朝向，那么拱顶则定义了拜占庭式会堂。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这组建筑分类中，拱顶表现出了鲜明的相似性。在贝丝阿尔法、提比里亚、加德尔等案例种，拱顶呈现出单个半圆形曲线，并且与较短的墙壁相连（图 4）。其宽度与中厅近似，小于墙壁的宽度，突出了南北走向的主轴线。拱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标高高于首层地面，并且与中厅之间以楼梯或坡道进行分隔。这种分隔，在许多情况下，被用于遮蔽的帷幔进一步强调，突出了拱顶作为圣龛的神圣性[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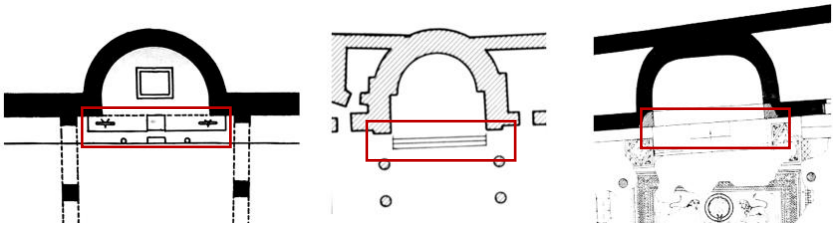

图 4 贝斯阿尔法、提比里亚、加德尔的拱顶平面[3]

平面布局上的多样性同样出现在罗马巴西利卡的发展过程中。早在法农会堂和庞贝会堂建立时，尽管不同地区之间有所差异，巴西利卡式的公共建筑主要采用四面柱列环绕中央厅堂的平面布局，形成环形相连的走廊，而非两翼分开的过道。约 200 年后，当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建立时（公元 324 年），其平面

---

[1] 图片来源（从左至右）依次为：

H. Kohl, C. Watzinger, *Antike Synagogen in Galilaea*, Leipzig, 1916: Tafell XI & Tafell II.

M. Dothan, "The Synagogues at Hammath-Tiberias," *Qadmoniot: A Journal for the Antiquities of Eretz-Israel and Bible Lands*, vol.4, 1968, p.123.

[2] Eric M. Meyers, "Ancient synagogues in Galilee: Their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etting,"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43, no.2, 1980, p.105.

[3] 图片来源（从左至右）依次为：

E. L. Sukenik, *The ancient synagogue of Beth Alpha: an account of the excavations conducted on behalf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2: plate 6.

M. Dothan, "The Synagogues at Hammath-Tiberias," *Qadmoniot: A Journal for the Antiquities of Eretz-Israel and Bible Lands*, vol.4, 1968, p.123.

M. Avi-Yonah, "Hamat Gader,"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1993, p.567.

特点是中厅、半圆形拱顶和高低长短不一的两对四列平行柱列与由此形成的两对侧翼过道（图 5）。克劳特海默教授对这种多样性进行了恰当的概括，认为君士坦丁时代的基督教巴西利卡缺乏特定的建筑形式规范，入口位置、平面朝向、中厅与两侧过道的相对高度、檐窗与长廊的存在都并非一成不变[1]。在公元 1-2 世纪期间，这些变化得到了充分发展，但君士坦丁时代在塑造基督教建筑类型方面具有决定意义：拉特朗圣若望大殿的建立，标志着罗马基督教的宗教建筑确立了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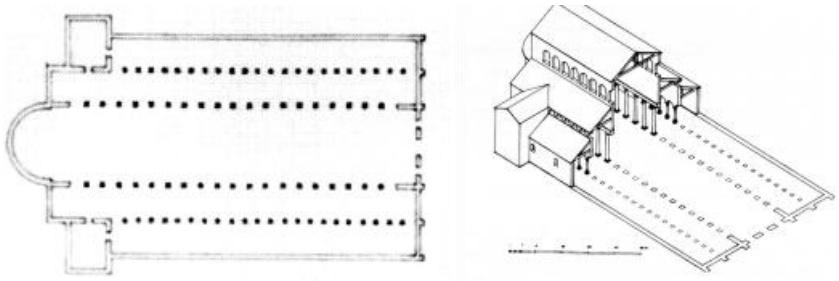

图 5 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平面图与轴测复原[2]

与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以及其后古典时代晚期的基督教堂相比，犹太会堂很少增加额外的一对柱列，它们在平面布局和整体尺寸上都更加类似建造年代较早的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巴西利卡公共建筑。并且，加利利犹太会堂的平面布局并未遵循任何既定的原型，在其跨越古典时代晚期的建造时期内，各种平面布局在时间与空间范围上难以被明确划分；这与罗马巴西利卡建筑发展的轨迹截然不同，后者在君士坦丁时期影响下，逐步形成更加标准的平面范式。

（二）空间构成

加利利地区的遗址提供了测绘复原建筑平面的基础，然而，对其他建筑元素的研究需要基于可信的三维重建，因此也更具挑战；不过，尽管对于建筑原貌的细节尚有争论，已有的复原模型已经能够提供充足的信息。对于犹太会堂的建筑立面，总结案例可知主要变体分为两类：一类较为普遍，其屋顶样式较为简单且不具有檐窗；另一类相对罕见，其屋顶具有侧翼，由此形成跌落式坡屋面，装有或大或小的单列高窗。前一组包括吉什、迦百农、莫兰和贝斯阿尔法，其主要建筑空间由一个与两侧过道等高的中厅组成。相比之下，属于另一组的基尔贝和提比里亚的中厅明显较高，并带有檐窗（图 6）。

---

[1] Richard Krautheimer, "The Constantinian Basilica,"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21, 1967, p.122.
[2] Richard Krautheimer, “The Constantinian Basilica,”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21, 1967: Fig. 4 & Fig. 8.

图 6 带有檐窗与不带有檐窗的犹太会堂的立面复原[1]

两种立面分类决定了内部空间的构成，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二层长廊（gallery）。在研究的早期阶段，对于二层长廊存在的假设非常普遍，而后来的考古证据对其中个别案例的情况，例如迦百农，提出了质疑，并且没有确切的记录可以证明这样的二层长廊在古典时代晚期的加利利犹太会堂中起到与如今相同的作用，即用以分隔男性与女性参与者[2]。尽管如此，相当多的轴测重建仍确切地支持在早期就已经存在二层长廊或阳台，尤其是对于第一组无檐窗屋顶的情况，例如贝斯阿尔法（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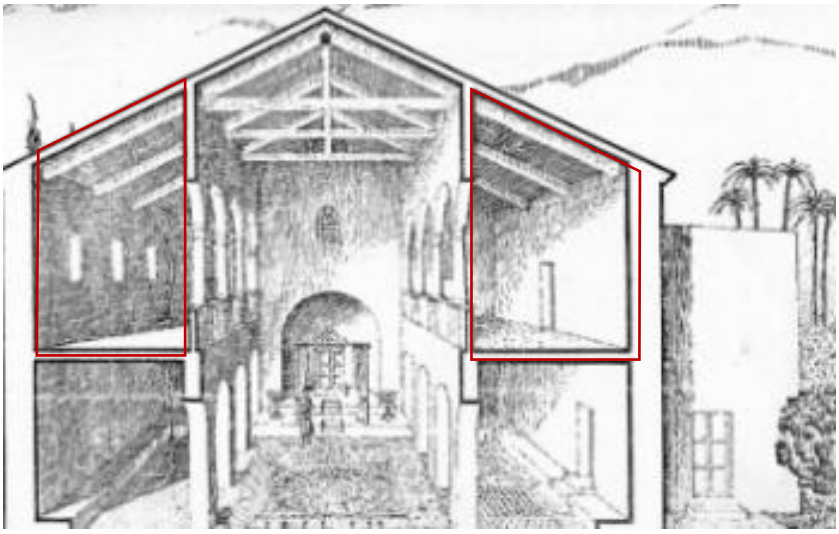

图 7 贝斯阿尔法的室内复原[3]

[1] 图片来源（从左至右）依次为：

Weiss, Zeev. "Stratum II Synagogue At Hammath Tiberias: Reconsidering Its Access, Internal Space, And Architecture," *A Wandering Galilean: Essays in Honour of Seán Freyne*, Brill, 2009, p.321；

Eric M. Meyers, Carol L. Meyers, & James F. Strange, *Excavations at the Ancient Synagogue of Gush Ḥalav*, vol. 5, Eisenbrauns, 1990, p.66.

[2] Eric M. Meyers, "Ancient synagogues in Galilee: Their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etting,"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43, no.2, 1980, p.100.

[3] E. L. Sukenik, *The ancient synagogue of Beth Alpha: an account of the excavations conducted on behalf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2: plate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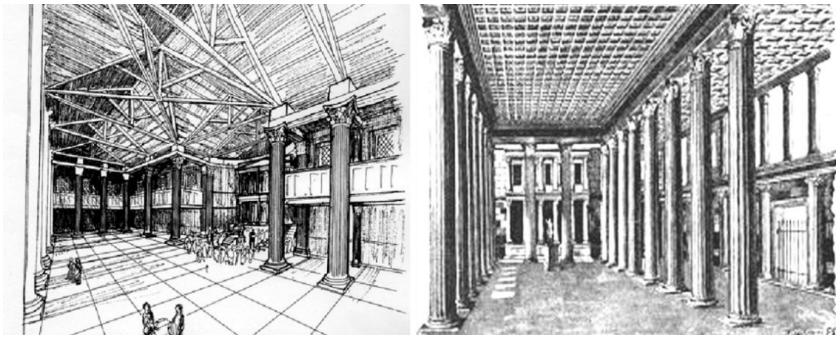

图 8 法农会堂与庞贝会堂的室内空间复原[1]

尽管二层长廊在犹太会堂中的最初功能仍不确定，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空间元素从古典时代在犹太会堂中出现，历经发展并保留至今；与之相反的是，在罗马巴西利卡的建筑发展过程中，二层长廊逐渐被淘汰。法农会堂的重建模型中显示中厅上方存在长廊，而同时期的庞贝会堂的重建模型则不具有相似的空间元素（图 8）；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建立的巴西利卡公共建筑中，朱里亚巴西利卡，以及同样位于古罗马广场的艾米利亚巴西利卡（the Aemilia Basilica）、乌尔皮亚巴西利卡（the Ulpia Basilica）都建有二层走廊。然而到公元 3 世纪之后，二层走廊就不再流行于罗马巴西利卡建筑中了[2]——君士坦丁大殿和拉特朗圣若望大殿都没有设置二层走廊。尽管在年代上的依然没有明确的前后划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加利利犹太会堂的空间构成并非借鉴同时期罗马帝国巴西利卡大教堂所确立的建筑原型，而是与更早期的罗马公共建筑同宗，并且这一空间元素的变迁在两者的发展历程中截然不同。

（三）建筑功能

犹太会堂与罗马巴西利卡建筑功能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功能确立先于实际建筑的建成，而后者则恰恰相反。许多研究人员在分析加利利犹太会堂的考古证据之前参考文献记录，而后者往往充当前者的佐证[3]。传统上，犹太会堂的主要目的在于其宗教功能，正如符类福音中所描述。例如，在《马太福音》13:54-58 和《马可福音》6:1-6 中，耶稣造访加利利的拿撒勒会堂，进行先知祷告并诵读《圣经》。除承担重要宗教事件外，早期犹太会堂服务于社区中

---

[1] 图片来源（从左至右）依次为：

Paolo Clini, "Vitruvius' basilica at Fano: the drawings of a lost building from 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m."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Photogrammetry Remote Sens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s*, vol.34.5, 2003, pp.121-126；

August Mau, *Pompeii, its life and art*, DigiCat, 2022.

[2] Richard Krautheimer, “The Constantinian Basilica,”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21, 1967, p.123.

[3] 参见 Samuel Rocca, "The Purposes and Functions of the Synagogue in Late Second Temple Period Judaea: Evidence from Josephus and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Flavius Josephus*, Brill, 2011, pp.295-313； Lee I. Levine, "The Synagogues of Galilee," *Galilee in the Late Second Temple and Mishnaic Periods Volume 1: Life, Culture, and Society*, 2014, p.130； Lidia D. Matassa, "Invention of the First-century Synagogue," 2018 等。

定期举办的礼拜仪式，并在特殊情况下为社区危机进行祈祷[1]。

作为宗教建筑，犹太会堂的神圣性体现在祈祷大厅和托拉神龛圣地之间的空间层次上。这一特点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25-31 中描述的会幕——即犹太会堂的前身——所具有的两层空间神圣性的递进，即圣所和圣殿（Holy and Holy of Holies），后者只有经过挑选的官员才能在受限制的情况下进入。在加利利犹太会堂中，这种更高层次的神圣性由“高坛”（bema）所代表（图 9）。“高坛”是建筑中的平台，根据对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追溯，托拉神龛（the Torah shrine）可能就放置在平台之上[2]。如前所述，当犹太会堂具有拱顶时，“高坛”有可能矗立其中，并用帷幔与中厅的其他空间隔开。在其他更常见的情况下，“高坛”固定在面向耶路撒冷的墙上，例如在吉什和迦百农中所见。

图 9 吉什的“高坛”遗址[3]

除宗教功能外，犹太会堂同样承担社区集会的职责。塞缪尔·罗卡（Samuel Rocca）根据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的文字记述和提比里亚遗址的考古证据得出结论，犹太会堂的多重身份包括主要公共建筑、法院和安息日（Sabbath）的市议会[4]。加利利犹太会堂存在另一佐证，即石凳（stone bench）的启用。类似的石凳在加姆拉保存得最为完善（图 10），在迦百农和马加达（Magada）的遗址中也十分明显。这些石凳既可用于会堂内的正式集会，也可用于非正式的聚集。这种清晰的室内空间的下沉与犹太会堂作为聚会、祈祷、学习之所的功能预设相吻合，而罗马巴西利卡则并不具有这样的装置，无论是在早期的公共建筑还是后期的教堂建筑中。

---

[1] Shubert Spero, "From Tabernacle (Mishkan) and Temple (Mikdash) to Synagogue (Bet Keneset)," *Tradition: A Journal of Orthodox Jewish Thought*, vol.38.3, 2004, pp.60-85.

[2] Eric M. Meyers, "Ancient synagogues in Galilee: Their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etting,"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43, no.2, 1980, p.102.

[3] 图片来源：Eric M. Meyers, "Ancient synagogues in Galilee: Their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etting,"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43, no.2, 1980, p.42.

[4] Samuel Rocca, "The Purposes and Functions of the Synagogue in Late Second Temple Period Judaea: Evidence from Josephus and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Flavius Josephus*, Brill, 2011, p.297.

图 10 加姆拉会堂遗址中的石凳[1]

罗卡在其研究中认为，提比里亚会堂在公共和司法方面的功能来源于罗马巴西利卡[2]。然而，就后者而言，其功能要更加复杂和多样。“巴西利卡”一词的指代本身就经历了多种建筑功能的变迁：从最初设计用于商业或司法集会，到用于军事演习，再到用作公共大厅，最后被确立为宗教建筑[3]。早在法农会堂建立的维特鲁威（Vitruvius）时代，罗马巴西利卡指代私人住宅中的家用集会建筑；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主要指古罗马广场上的公共建筑，用作世俗集会的观众厅；到了古典时代晚期，它则逐渐承担宗教仪式[4]。可以说，罗马巴西利卡建筑功能的多样性涵盖了加利利犹太会堂可能的多种职能，而后者的多用途之所以能够被其建筑形式所满足，是受益于前者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兼容性。

在君士坦丁将巴西利卡作为基督教教堂的建筑类型后，罗马巴西利卡的宗教目的也相应地得到了强调。然而，即使从宗教建筑视角出发，罗马巴西利卡与加利利犹太会堂的中心功能依旧有所不同。罗马的教堂，尤其是在君士坦丁时代，承担着彰显皇权与皇帝本人的优越性、权威性，以及帝国的稳定与辉煌。罗马巴西利卡教堂的奢华壮观，作为一种象征形式，是任何加利利犹太会堂，作为罗马行省中的公共建筑，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尽管加利利犹太会堂可能是当地社区的中心，但它们与较早时期的多功能巴西利卡更为相似，而非同时期的罗马巴西利卡教堂。

四、结论

通过对从古典时代晚期的加利利犹太会堂和罗马巴西利卡建筑的代表性实例进行比较分析，在平面布局、空间构成和建筑功能方面得出了如下结论：

---

[1] 图片来源：Research Center of Ancient Synagogue in the Land of Israel, “Gamla,” [2024-12-24], https://synagogues.kinneret.ac.il/synagogues/gamla/

[2] Samuel Rocca, "The Purposes and Functions of the Synagogue in Late Second Temple Period Judaea: Evidence from Josephus and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Flavius Josephus*, Brill, 2011, pp.300-304.

[3] Richard Krautheimer, "The Constantinian Basilica,"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21, 1967, p.121.

[4] J.B. Ward Perkins, "Constantin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Basilica,"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22), 1954, p.74.

1. 犹太会堂平面通常采用单柱列，部分具有一个比建筑宽度更短的拱顶；犹太会堂与罗马巴西利卡平面都具有多样性，但前者没有发展出建筑范式，而后者则逐渐形成标准体系；
2. 复原重建的模型显示，犹太会堂在古典时代晚期已具有二层走廊，而罗马巴西利卡建筑的二层长廊经历了从有至无的过程，在同时期的教堂建筑中已经难以见到这一空间元素；
3. 犹太会堂的建筑功能的确立早于其实际建成，在宗教职能外还具有多种公共用途。相比之下，罗马巴西利卡历经多种功能的变迁，而后其宗教意义含义超越其他潜在功能，并突出了对于权力的象征意义。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相比于同时期的罗马巴西利卡教堂，加利利会堂与更早时期的巴西利卡公共建筑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趋于多样而非统一。另一方面，尽管由于变化形式的复杂性与其在年代划分上的模糊性，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结论难以确定；但从加利利犹太会堂与罗马巴西利卡建筑在多方面的相似性与其出现时间上的关联性已经可以得出，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相互的影响塑造了两种建筑不断演变的特征。这样的交流贯穿了犹太会堂建筑的发展历史，时至今日，犹太会堂也并不固定地遵循任何建筑范式。尽管宗教建筑一向被视为强调象征性与符号性的建筑形式，犹太会堂在其建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仍展现出鲜明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 August Mau, *Pompeii, its life and art*, DigiCat, 2022.
2. Dennis E. Groh, "The Stratigraphic Chronology of the Galilean Synagogue from the Early Roman Period Through the Early Byzantine Period (ca. 420 CE)," *Ancient Synagogues,* vol 1, Brill, 1998.
3. E. Langlotz and F. W. Diechmann, "Basilika," *RAC*, vol.1, Stuttgart, 1950, 1225-1259.
4. Eliezer Lipa Sukenik, "Ancient synagogues in Palestine and Greece," *The Schweich lecture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34.
5. Eliezer Lipa Sukenik, *The ancient synagogue of Beth Alpha: an account of the excavations conducted on behalf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2.
6. Eric M. Meyers, "Ancient synagogues in Galilee: Their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etting,"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43, no.2, 1980, pp.97-108.
7. Eric M. Meyers, Carol L. Meyers, & James F. Strange, *Excavations at the Ancient Synagogue of Gush Ḥalav*, vol. 5, Eisenbrauns, 1990.
8. H. Kohl, C. Watzinger, *Antike Synagogen in Galilaea*, Leipzig, 1916, pp.4-40.
9. J.B. Ward. Perkins, "Constantin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Basilica,"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22), 1954, pp.69-90.
10. Jodi Magness, "The question of the synagogue: the problem of typology," *Judaism in Late Antiquity 3. Where We Stand: Issues and Debates in Ancient Judaism*, Brill, 2001, pp.1-48.

11. Lee I. Levine, "1. Diversity in the Ancient Synagogue of Roman-Byzantine Palestin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Diversity and Rabbinization: Jewish Texts and Societies between 400 and 1000 CE,* vol.8, 2021.
12. Lee I. Levine, "The Synagogues of Galilee," *Galilee in the Late Second Temple and Mishnaic Periods Volume 1: Life, Culture, and Society,* 2014, pp.129-150.
13. M. Avi-Yonah, "Ancient Synagogues," *Ariel*, vol.32, 1973, pp.38-42.
14. M. Avi-Yonah, "Hamat Gader,"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1993, pp.567-569.
15. M. Dothan, "The Synagogues at Hammath-Tiberias" Qadmoniot: A Journal for the Antiquities of Eretz-Israel and Bible Lands, vol.4, 1968, pp.116-123.
16. Marilyn J. Chiat, "Synagogue and Church Architecture in Antiquity: A Comparative Study," *Proceedings of the 8th World Congress of Jewish Studies*, 1982.
17. Paolo Clini, "Vitruvius' basilica at Fano: the drawings of a lost building from 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m."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Photogrammetry Remote Sens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s*, vol.34, 2003, pp.121-126.
18. Raimo Hakola, "Galilean Jews and Christians in Context: Spaces Shared and Contested in the Eastern Galilee in Late Antiquity," *Spaces in Late Antiquity*, Routledge, 2016, pp.141-165.
19. Richard Krautheimer, "The Constantinian Basilica,"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21, 1967, pp. 115–40.
20. Robert Goldenberg, "The Broken Axis: Rabbinic Judaism and the Fall of Jerusale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45, no.3, 1977, pp.353-353.
21. Samuel Ball Platner, "Basilica Constantini," *LacusCurtius • The Basilica of Maxentius (Platner & Ashb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22. Samuel Rocca, "The Purposes and Functions of the Synagogue in Late Second Temple Period Judaea: Evidence from Josephus and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Flavius Josephus,* Brill, 2011, pp.295-313.
23. Shubert Spero, "From Tabernacle (Mishkan) and Temple (Mikdash) to Synagogue (Bet Keneset)," *Tradition: A Journal of Orthodox Jewish Thought*, vol.38, no.3*,* 2004, pp.60-85.
24. Valentin Müller, "The roman basilic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41,1937.
25. Virgilio C. Corbo, Stanislao Loffreda, & Augusto Spijkerman, "La Sinagoga di Cafarnao: dopo gli scavi del 1969," *Publications of the 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Collectio minor*, 1970.
26. William G. Tachau,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ynagogue,"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1926, pp.155-192.
27. Z. Yavor, "The Synagogue and Miqveh Complex" in Gamla II; *The Architecture. The Shmaria Gutmann Excavations; 1976-1989.* ed. D. Syon and Z. Yavor, IAA Reports; no.44, Jerusalem, 2010, pp.40-61.
28. Zeev Weiss, "Stratum II Synagogue At Hammath Tiberias: Reconsidering Its Access, Internal Space, And Architecture," *A Wandering Galilean: Essays in Honour of Seán Freyne*, Brill, 2009, pp.321-342.